

主编·陈国民·俞正熙·陈隆涛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雾都沉沉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赵世亮 赵学军 邱涛 著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雾都沉沉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赵世亮 赵学军 邱 涛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晋]新登字 3 号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左执中 胡晓青
装帧设计	易 一

雾 都 沉 沉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赵世亮 赵学军 邱 涛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440-0745-6

G·746 定价: 4.80 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薄一波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

序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场战争却依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在中国烧杀抢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汉奸败类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种种丑恶卑劣行径；不愿做奴隶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奋起杀敌、浴血抗战，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最为辉煌的篇章，永远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育。

抗日战争是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我国的独立和振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解放的斗争，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广泛参加的反侵略战争。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维

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外敌侵略、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重温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注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发展，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迎接中华民族现代发展过程中光辉灿烂的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出版了。它以鲜明的爱憎、生动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可以帮助青少年读者了解这段历史，从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中受到震撼和启迪，以激发爱我中华、锐意进取、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壮志豪情。尽管丛书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全貌，在构思与人物、事件的选择上也不是尽善尽美，但对青少年进行切实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它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材料。

杨成武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目 录

初期抗战	(1)
一 卢沟桥的枪声	(1)
二 抗战与谋和——两个无法调谐的音符 ...	(4)
三 “以空间换取时间”	(9)
四 正面战场的四次大交锋	(13)
五 “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	(22)
六 巩固大后方	(26)
二期抗战	(32)
一 在“和平”幌子下出笼的汉奸政权	(32)
二 “检讨过去之得失，指示今后之方针”	(40)
三 反击日军的“有限进攻”	(47)
四 国民党政策重心的大转弯	(54)
五 艰难岁月	(60)
六 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	(65)
待机西南	(74)
一 太平洋风暴	(74)

二	进入四强行列的中国	(80)
三	沉沉雾都，遍地特务	(87)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集大成——《中国之命运》	(94)
五	再度掀起“反共”恶浪 ——1943年第三次反共浪潮	(100)
六	无法管制的经济	(107)
坎坷的前途		(117)
一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转折	(117)
二	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	(125)
三	迅速走向深渊的国民党	(132)
四	和民主宪政唱反调	(139)
五	“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了”	(148)
六	“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	(155)

初期抗战

一 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夜，一队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北平（今北京）以南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约11时许，日军演习部队诡称丢失了一名日兵，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寻，旋即包围了宛平县城。次日，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要求入城调查。国民党冀察当局答应此要求，并派人与日方组织调查人员，同往宛平城。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县城，接着又向卢沟桥附近龙王庙的中国驻军猛烈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在何基洋旅长指挥下，奋起反击，一天内击退日军三次进攻，击毙日大队长一木清直，并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龙王庙等地。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通过战争和鲜血从德川幕府手中夺过日本国政权的明治天皇等人，就决心以战争为武器，使日本当上亚洲霸主，

进而争雄世界。因此，依靠对外扩张为太阳帝国弄到更多更大的政治经济权益，就成为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日本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1870年，日本军方将“大陆政策”具体化，提出了《征讨清国策》，强调在实战中，必须先夺取朝鲜，作为进攻中国的桥梁；抢先攻占台湾，作为侵略东南亚的基地。“大陆政策”和《征讨清国策》一出笼，“到中国去发财！”就成为许多日本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之后，腐朽的满清王朝在与日本国的多次较量中都被打得大败。日本帝国主义者也趁机利用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军等殖民机构，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关东军逐步进驻平津一带。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策动了“华北事变”。他们大力收买汉奸，成立汉奸政府，鼓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政府于1936年1月制定的《处理华北纲要》，提出“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日本军部也开始制定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便是占领华北。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战演习。5、6月间，日

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侵华战争。6月初，疯狂叫嚣“对华一击论”的近卫文麿受命组阁。侵华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日本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所以，“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华战争而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一面施放和谈烟幕，行缓兵之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频繁举行四相、五相和内阁会议，研究处理变局的策略，不久，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7月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和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达密云、怀柔、天津。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驻本土的第五、六、十师团开赴华北。同时，大批飞机、大炮、坦克也由日本、朝鲜和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往平津一带。

正当日军紧锣密鼓地向天津调兵遣将时，7月14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了反共、取缔排日言论和团体、中国军队撤出华北等七项要求。宋哲元幻想以和平方式“就地解决”，保持冀察地区的既成局面，竟不顾日军源源增兵入关的严重局势，答应了香月清司提出的条件。之后，他下令撤除北平街头的备战设施，禁止群众抗日活动，拒绝群众对第二十九军的支持和慰劳。但是宋哲元的忍辱对日妥协，并没有遏制住侵略者的铁蹄，日军再次以巨炮轰击长辛店及宛平城。7月25日，日军一大队由天津向廊坊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向廊坊西北退却，次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平津联系。7月26日，一部日军袭击北

平广安门驻军，遭到中国守军刘汝珍团的阻击。日军即以“广安门事件”为由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第二十九军于28日午前撤出北平，遭到宋哲元拒绝。28日，松井又通知宋哲元，日军要“采取独自行动”。同日，日军便集中大量兵力，并配有3个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几架飞机，大举进攻北平南苑。中国驻南苑守军第一三二师在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浴血奋战，约5000官兵壮烈殉国。佟麟阁和赵登禹在指挥部队抗击时牺牲，南苑失守。29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北平陷落。接着，日军猛攻天津。守卫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带领下，在天津火车站、东局子日军用飞机场以及海光寺等处，与日军血战。终因寡不敌众，于30日撤出天津。至此，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军随后向华北腹地大举进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而进行神圣抗战的开始。

二、抗战与谋和——两个无法调谐的音符

卢沟桥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无退路可走了。7月8日，中共中央急切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先声压人，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此此次事变也高度警觉，立即作出反应。在中共发表通电的当天，蒋介石急电尚在东陵的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速返保定指挥作战，誓守北平。同时，蒋介石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军队，7月9日，急电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其火速“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火速“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准备策应第二十九军抗敌。此时，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何应钦不在首都南京，蒋介石在调动孙连仲军队时，又“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川返京筹划全面抗战事宜”。7月10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指示宋哲元，一不得签定任何条约，二不得后退一步，三准备牺牲。北平天津已十万火急，刘峙、孙连仲、胡宗南、万福麟、商震、汤恩伯、高桂滋、刘多荃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到蒋介石电令后立即率部驰行保定、石家庄方面。

国民党政府针对日寇的扩大侵略，在尽快部署军队的同时，为协同作战，在石家庄特设行营，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要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相机配合，以应不测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当即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日军的侵略，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在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血盆大口威迫下，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已不得不准备抵抗了。

当时，蒋介石感到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日交涉、国内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教育问题绞合在一起，十分棘

手。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出面发起各界人士的“谈话会”，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 200 余人到庐山商讨国家大事，计划在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分三批“谈话”。

一切进展顺利。7 月 16 日上午 9 时，第一期谈话会如期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了。国民党的党政要人蒋介石、汪精卫、于佑任、戴季陶、冯玉祥、李烈钧等出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应邀前来，社会贤达如杜重远、马寅初、吴贻芳、钱昌照、叶楚傖等人也欣然莅会，宾主 158 人聚集一堂。17 日上午，蒋介石在第二次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并发表了对日外交谈话，即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沉痛地指出：“现在的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了，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与会者静静地听着，心中深有同感，不由引起了共鸣。蒋介石先生坚决地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表明国民党确定下准备抗战的方针。但是，尽管蒋介石也在谈话中说“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

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国民党政府却依然抱着同日本谈判妥协的幻想，所以，还没有下决心对日绝交宣战。7月16日，在庐山谈话会召开的当天，国民党政府分别向英、美、法、意、葡、德、俄、荷、比等国政府递送备忘录，表示愿按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斡旋，用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争端。19日，外交部特地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去备忘录，提出“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和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蒋介石也匆匆接见英、美、德、法四国驻华大使，盼望列强出面干涉日本侵略。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因为在华北兵力不足，无力迅速扩大侵略，便以同宋哲元谈判为幌子，暗中增兵华北。7月下旬，日军各路援军先后到达攻击位置后，立即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8日攻陷廊坊，29日闯入北平，30日占据天津。对日妥协一时行不通，蒋介石在平津沦陷后回答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蒋介石十分明白，对日战争已不可避免，中国只有抗战一途。

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凶焰万丈，不可一世，以为真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求和不予理睬。8月初，日在上海不断制造事端，寻隙挑衅。日寇在上海的活

动，严重威胁着南京、江浙地区，蒋介石忍无可忍，8月8日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得寸进尺，了无止境，现在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号召“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8月13日，日寇挑起“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14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终于不得不下定了。

但是，在全民投入抗战的声浪中，国民党政府中仍有对日谋和、对日妥协的不和谐的音符，其中，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便是声源。汪精卫在抗战开始后，被日寇凶猛的攻势所吓住，大肆散布民族失败论，策划促使蒋介石对日妥协，他公开发表《最后关头》广播讲话，胡说什么“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国联代表团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国联制止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之行动”。但是，列强相互推诿，末了，英国提议九国公约国公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10月11日，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终于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寄以极大的希望，但是结果却让他十分失望。不过，他仍旧没放弃这方面的努力，1937年9月他派出蒋百里赴意、德两国，恳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及驻日大使狄克逊允诺居中调停。

不久，上海、太原失守，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再次将谋和希望寄托在陶德曼调停上。为此，12月2日，他召

集白崇禧、徐永昌、唐生智、顾祝同等人，讨论同日谈判条件。正当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解时，日寇攻入南京，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而且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一、中国必须放弃亲共、反日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反共政策；二、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赔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蒋介石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蒋介石一看十分气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的话。

然而，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国民党几次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主要讨论日本所提的条件，蒋介石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对付日本。日本对此极为不满，策划起拉拢汪精卫叛国的“桐工作计划”。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思想的最终归宿，便是投降日寇当了汉奸。1938年底，汪精卫的投敌，激起全国民众声讨，同时，在蒋介石对日妥协的道路上也设了一个障碍。

三 “以空间换取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作出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预测。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就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前一种观点是“亡国论”，后一种观点是“速胜论”。这两种观